

美國 外交政策 兩百年

吉爾伯等著

淦金超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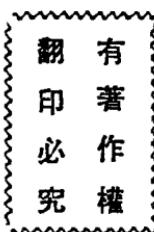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美國 外交政策 兩百年

吉爾伯等著

淦金超 譯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576. (66—6)

美國外交政策二百年

著作者：吉爾伯等

翻譯者：淦克超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字第一八五號

發行所：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臺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文化大樓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一日初版

定 價：新 台 幣 伍 拾 元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引言

問——世事何以至此？

答——有其理由，說來話長。

問——難道不可以長話短敍，像房龍「人類的故事」？

答——可以，請看「美國外交政策二百年」。

問——那是美國的，與我們何干？

答——相干；世界最近的外交（連同經濟的外交）都綜合得很好，在這本新書裏。

美國事實上是最近世界政治中的一部發動機，因之我們從這方面可以找到來龍去脈的。

問——過去的事過去了，我們何如祇管現在？

答——有些事的根在過去，以阿衡突便是顯例。今夏美總統卡特與以總理比金晤面時，對背聖經；我們若于過去一無所知，豈不要笑他們為書呆？

問——日下舊聞聽多了，頗感不耐，怎麼好？

答——這就在選擇，在材料之精新，與我們的現實環境有關的。

問——縱令有關，誰能說作者無偏見？

答——偏見人人有，或多或少；作者的眼光及品衡，都不是經過了驗光配鏡，或度量衡檢定的，不過事有其實，儘可檢核或再估評的。

問——譯本是如何翻譯的？

答——原本以七篇合成，於今夏在紐約出版，但已分載於季刊各期。譯本包括了六篇，省略了可能引起爭執的戴維斯的「美國與東亞」。為使每篇至多不超過二萬字起見，稍省略可省略的字句。

問——季刊中的論文有深度而專門；為何吃苦頭，不怕惹麻煩？

答——提供一些新資料及高水準的見解於國人，總是「不作無益害有益」，「勿以善小而不為」。此季刊各圖書館及機關均有陳列，至盼核對、批評、指教！

序 言

為慶祝建國二百週年，美國外交學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於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一九七六年七月號及十月號，又一九七七年一月號，連續分別發表了七篇系統論文。論述範圍都預先有頗好的比例安排，自美洲以至歐亞，自政治以至經濟，作提綱擇要的敘述及評估，而篇與篇之間絕少重疊或矛盾。主編者為外交季刊總編輯，曾任主管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威廉彭岱。一九七七年夏，他彙編各篇，冠以今名，出版為外交學會書籍之一，由紐約大學出版部發行，計三六八頁，定價十五美元。

以這幾位特約作者而論，確屬一時之選；以文章之內容品質而論，則題材精新，觀察透闢，正供讀者先睹之快。各篇次第有如左列：

一九七六年七月號

(一) 二百週年之感想 (吉爾柏)

譯者序。

Felix Gilbert, "Bicennial Reflections"

〔美英關係〕百年（上譯）〔母女關係及殖民地政策〕

Alaister Buchan, "Mothers and Daughters"
(or Greeks and Romans)

〔美國與蘇俄〕（肯楠）

(George F. Kenn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一九七六年十月號

〔美國與歐洲平衡〕（克雷格）

Gordon A. Crai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Balance"

〔美國與拉丁美系〕結束霸國（羅文察編）

Abraham F. Lowenth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Ending the Hegemonic Presumptions"

一九七七年一月號

〔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一七七六——一九七六（金德柏著）

Charles P. Kindleberger,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776-1976"

還有一篇，戴維斯的「美國外交政策兩百年：美國與東亞」，原是 John Paton Davis,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merica and East Asia"，這是一篇涉及中國的文章，不免引起爭議的，關於作者的見解是否有偏，且不必評介。

第一篇「二百週年之感想」，作者吉爾柏為MIT榮譽退休教授，首先把歌德認歷史僅有鼓勵作用，與史家之堅信鑑往知來之相反主張來比較，從事檢討而不武斷，讓讀者自省裁。他認為美國獨立時的環境是絕無僅有的：既無外患，而有供發展的廣袤沃野。因之華盛頓在告別演辭中，叮囑要避開歐洲的糾纏；那「政治的聖經」，開國元勳麥迪遜與漢密爾頓都參加了起草，並非華盛頓午夜挑燈，英謀獨運的結果。吉爾柏着重時異事變，那建國祖先關於外交的名言偉論，包括華盛頓那「政治的聖經」在內，已不復有權威性，祇是美國人民對外交仍有些十八世紀的信念。我們對於這種轉變之由來及趨勢，以及美國人的已有認識，似乎應該認清的。

布謙的「美英關係兩百年」，自係名篇佳製，亦祇有英國的高手深知數十年來內情者，纔能闡析許多關鍵性的事實，竟如此關心中國的晚近外交，而我們早就應該已經知道的。至於美英關係之轉變，與英國自何時起纔承認新現實，以及承認新

現實後，美英關係趨勢之評估，有許多準機密及微妙性，我們可以從這位前英國戰略研究所所長獲悉的。可惜名篇未成，作者即歸道山了。

肯楠為美國第一位老牌蘇俄專家，曾任駐俄又調駐南斯拉夫大使，亦是圍堵政策之建築師，著作等身，而文筆健舉。我們沒有充分時間去閱讀他的長篇巨著，看過他這篇「美國與蘇俄」，亦可瞭知他之所以主張對俄低溫（*Détente*）之來龍去脈。這是今日國際情勢之關鍵，亦影響於我們的對外關係至切的。使用低溫這名詞，執行低溫這項工作的人們，對於低溫各有其概念，專從字典裏找出和解一詞，究竟恰當與否，值得再斟酌。肯楠的估評亦值得我們再估評。

克雷格是斯丹佛的講座教授，所作的「美國與歐洲平衡」讀來使人重有深感。

平衡（或譯均勢）曾為威爾遜所深惡痛絕，我們亦極不欣賞那拾蘇張之緒餘，驕縱橫之慣技的，原以為那是歐洲外交史上的陳迹而已。不料十四歲纔離歐洲，移民美國的季辛吉竟把歐洲那一套帶往新大陸了，而且運用得非常巧妙，幾於梅特涅不死，俾斯麥復生了。依常識的看法，季辛吉下臺，民主黨執政，卡特總統的作風應該有威爾遜、羅斯福的流風遺韻了。照克雷格的論調看來，祇要有了以幾個國家組織的國際社會，平衡（均勢）之追求是無可避免的。讀者是否相信這結論？沒要緊，讀

者細閱「美國與歐洲平衡」一文，然後分析比較，作我們自己的評估。

「美國與拉丁美洲：結束霸圖」之作者係羅文索爾，美國外交學會的研究所所長。外交學會會員的見解，往往在一年半載後，為國務院融納在實際政策中的，雖則那見解祇代表研究者個人的。羅氏的論調是要全盤拋棄門羅主義，亦不要重述外交辭令，謂與拉丁美洲有特殊關係，以資拉攏。他在篇末提出五項原則，爽直的包括了結束霸圖。這對於稍熟美國外交史者總不免感到有些新奇，縱不驚異，而傷今懷古者恐不免要說，「拉丁美洲在，霸圖往事空了。」可是——請拭目以觀——當今巴拿馬運河新約之簽署及簽署之周圍氣氛，那裏有的是拉丁美洲之新現實。這新現實不僅與一百五十年前，門羅主義宣佈時不同，亦與十年前甘迺廸——詹森時代迥異。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何況今日中華民國的友邦，半數都在拉丁美洲。

外交政策與對外經濟關係幾乎是不可分離的，尤以晚近這關係更密。金德柏格係MIT的榮譽退休教授，所作「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一七七六至一九七六年」，使我們對於這方面的有關事實及問題，盡收眼底，而有系統的認識。不錯，系統的瞭解很重要，但治學任事者多忙碌，每不耐回溯過去，以為往事如烟，時異事變。其實有許多歷史上的因素，是我們無法漠視的。所幸金德柏格對於如此複雜而長期的

各種因素之發展，有妥善的選擇安排。他對於第一次大戰前的對外經濟之評述甚精要，而愈晚近的愈精詳。美國的經濟發展，及其在各階段所處的地位，乃至決策之動機及背景，均有析論。過去數十年中，幾番重大決策，現在回看起來，似乎不夠明智的，亦多有種因素，包括國內利益集團之牽掣，致影響世界經濟秩序，真是堪歎惋而亦有趣的。別的姑且不說，今後世界經濟秩序究竟如何維持？還可以由美國來領導嗎？是否可以夥同德國，或夥同德、日，作兩頭或三頭的領導呢？金德柏格評估了，但我們似乎應該用思考，作我們的評估呢。

不用說，回顧美國外交政策，不能省略東亞；外交季刊想到了，但筆者不擬評介。

自獨立到一九七六年的紀念，美國雖然只有二百年的歷史，但源流及軌迹都可回溯，而有系統的瞭解。本書為研究及討論之張本，應是合乎實用，而且最新鮮的。

目 錄

引 言

譯者序

一 二二百年之感想	吉爾柏	一
二 美英關係兩百年	ト 謙	二三
三 美國與蘇俄（一九一七—一九七六）	肯 楠	六一
四 美國與歐洲平衡	克雷格	九九
五 美國與拉丁美洲結束霸圖	羅文索爾	一二三
六 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一七七六—一九七六）	金德柏格	一五五

譯後漫筆

一、二百週年之感想

原名 "Bicennial Reflections," *Foreign Affairs*, July, 1979. 作者 Felix Gilbert (吉爾柏)。這位歷史學家的文章是美國外交季刊為紀念美國建國二百週年而特約的文章之第一篇。他所發表的是一位歷史學家的綜合感想，檢討是以外交政策之原則與實際為主。

有一件故事，不妨徵引與吉爾柏的議論相比較。十九世紀中葉，法國歷史學家兼政治家吉佐(M. Guizot)曾于閒談中，詢問美國文豪羅威爾(J. R. Lowell, 1819-1891)，以美國的共和，依羅氏觀察，究竟能保持多久。羅答：「與開國諸公的觀念仍繼續有支配力之時期共長久。」吉佐很同意他的見解(見Lowell, "The Independent in

Politics⁴⁾。)

比彙而觀，吉爾柏的看法似乎與羅威爾的大有差別，不過羅氏談的是美國立國的一般原則，而吉爾柏指的是外交思想之原則。國民可以把握內政，而外交則受外來因素之影響甚多，時異事變，開國祖先所指示的原則已喪失其永久的效力與權威了。篇中列舉開國祖先重理想、尚道德、講原則，而實際政治促使其在外交上，不得不依樣訴之權謀術數，尤足發人深省。他認為美國人民對外交，仍抱有十八世紀的觀念，而美國外交政策之道德主義的性格頗不適於隨機應變。這些大致是他的估評，值得我們再觀察而再思考的。

一

「歷史所能給予我們的，至多祇是激起我們的熱忱。」——這是歌德的名論，評斷歷史之價值。歷史學人頗不高興這種評斷，每認為仔細分析往事，與其他時期

的社會之結構，便能幫助我們瞭解所處的世界之複雜性質。但若我們就歷史之較普遍的及較原始的影響來看，歌德的話饒有至理。國家的豐功偉烈與先哲前賢之重喚起，足以增進社會融洽，而造成未來時期的豪情及信心。勝利之紀念、一國的關鍵年週年紀念之舉行——諸如此類的其他慶祝之有危險性，就是激起了國民性之劣點，而沒有激起國民性之優點——有其理由，就是顯露一個社會建立其上的價值，並加強社會之團結。馬其亞維利說過，每一社會必須時時返其本；這正是各國所已實行，而且繼續實行的。

縱令我們贊同，以爲此類紀念之舉行乃是政治生活中所固有，仍須認定，往昔偉大事件之慶祝，在美國有特殊性質及奇特的危險性。倘若歐洲那些大國過去之使命，在其漫長史乘中，經歷了許多變化與革命，已頗模糊，不妨簡稱那使命爲熱忱，此類紀念却在美國有更恰切的意義，仍然相當接近它的出現爲獨立國家之年歲。紀念乃含有返到這新國家藉以建立的原則。倘若現世界不符合那些原來的期望，其故就在有意的或無意的離開了建國祖先的智慧。信念及堅信被認爲鼓勵了早期共和之組織的，現時依然適用而有效，國家的慶祝足以提醒美國人民這共和國之真正性格，以及它的制度之優越。美國仍然生活於十八世紀制定的憲法之下。以國家內部

而論，已發生的一切變化，自建國之規模初具時，已經顯出，考慮那些鼓舞建國之原則是有意義的，因為那些原則提供了準則，而現時的政治生活可藉以較量的。

但同一的權威人士所發表的外交思想之原則，情形便完全不同。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政治社會之內部組織操在公民們之手，公民們可以依己意，在已建立的基礎上從事建樹。同等的自由選擇、自由指揮、與等量的自決，並不存在於外交範圍裏。外交政策產生於國家意志僅能形成其小部分；其他強國與外鑠因素對那外交政策發生相當的作用的。因之，影響力之可以用於外交政策之範圍內的變化上的便有限了。這樣看來，對嚮導這年輕共和國之初步之原則，相信其永久效力與權威，而引伸到外交方面，就有危險性。可是此類見解已是牢不可破；縱令大家都承認時異事變，今非昔比，仍有一種傾向，固守那些臆斷及成見，呈現於早年對外交之態度上的。二百年紀念之慶祝正可以回想建國祖先在外交方面的觀念及行動究竟如何，及其在歷史過程中所表示的意義。

二

英國在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變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之環境是絕無僅有的。當法

國退出了加拿大，而在南方的西班牙之權力弱化了，沿着大西洋東岸的殖民地已無外患之威脅。殖民地之向西拓展一直是殖民自己進行的，不是英國的軍力擔任的。英國原來不把北美大陸看得比西印度羣島產糖的島嶼更重要些。從英國人看來，美洲殖民地之用途，主要爲製造品之市場，而無可避免的引起問題：究竟爲了英國提供的保護是否值得受那些拘束之不便利，有如隱含在母國與殖民地之關係中的，以及那些妨礙殖民地之商業發展的。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所以不憚費辭，乃是因爲這就說明了何以當這新國肇建時，商業自由及航行自由何以顯示爲主權之最重要因素，而亦爲外交政策之最基本的宗旨。

可是英國與美洲殖民地之關係需有新規定，那要求適時興起了——那就是美國產生之時期，獨特的環境中的最重要因素——當歐洲政治之整套體系遭受嚴厲批評時，亦當統治階級似乎不顧而且鎮壓那些代表了社會最有生機的力量之集團及利益的。在那時期中，中產階級充爲商業擴展及工業活動之提倡之動力，自己感到够強，可以對一個統治階級，植根於封建的過去的壟斷權力及特權的，從事挑戰。這緊張造成了氣氛，利於啓蒙時代的哲學家們對舊體制 (*Ancien Régime*) 之壓迫性的而又不合理的制度及精神作指摘。一個特別的攻擊目標就是外交政策之執行。三